抗日战争对海外华侨社团组织演进的影响
——以加拿大华侨救国团体为例（1931—1937）

王 瑞
（临沂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0）

［关键词］抗日战争；加拿大华侨；救国团体；组织演进

［摘 要］论文基于致公堂创办的《大汉公报》和其他一手资料，以加拿大华侨救国团体为例，考察民族危机背景下华侨社团转型的原因，梳理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华侨救国团体的演进过程，并探究救国团体的发展在侨团转型中的作用，以此揭示抗日战争对海外侨团组织演进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激发了华侨的爱国主义热情，并对侨团的组织目标、关系网络和动员能力提出新要求。在此背景下，加拿大华侨救国团体兴起于西海岸的大城市，于七七事变前扩散至内陆和东部的40余座城镇，经历了由兴起、扩散、竞合到趋向统一的进程。以救国团体为代表的侨团，逐渐朝向功能公共化、关系密切化、网络组织化和运行制度化方向发展，推动了加拿大侨团的组织变革。

［中图分类号］K264；D634.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26）03-0069-14

The Evol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Associations in Canada (1931–1937)

WANG Ru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inyi University, Linyi 276000, China）

Key word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hinese in Canada;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association;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Abstract: Using *The Chinese Times* published by the Chee Kung Tong and other first-hand materials, this paper with a focus on Canada investigates how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were transformed amid the national salvation of China. After the September 18 Incident, the spirit of Chinese patriotism placed new demands o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with regards to their organizational goals, networks, and capabilities of mobilization.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associations appeared in major Canadian cities on the west coast and quickly spread to more than 40 towns in the inland and eastern regions. Prior to the July 7 Incident, all of these associations underwent a process from emergence and expansion, to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to eventual integration. Their development gradually reshaped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Canada, which increasingly expanded their public-oriented functions and strengthened inter- association ties as well as networks among regional associations, leading to their institutionalized operations.

［收稿日期］2025-01-10;［修回日期］2026-03-27
［作者简介］王瑞（1998—），女，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加拿大华侨华人史。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是华侨史上最伟大的爱国运动。[1]抗战对华侨与祖国关系、与定居地关系以及华侨社会自身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2]其中，抗日战争对海外侨团的组织演进发挥了重要作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抗日救国成为海外华侨的共同使命，侨团原有以地缘、血缘和业缘关系为基础的组织结构受到冲击，以民族救亡为目标的救国团体应运而生，并随着抗战局势的变化不断扩散和逐步统一，由此推动了侨团社会功能、关系网络、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的转型。

从抗战史研究来看，不少学者从宏观上指出抗日战争促进了侨团的团结与协作，[3]但并未继续进行系统、深入的案例考察。从海外华侨社团研究视角出发，海外侨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发展历程，是研究战后海外华人社团延续与变迁的逻辑起点。相关研究从全球范围或不同国别考察了二战期间华侨救国团体的兴起背景、组织类型和特点。[4]但该领域仍存在继续拓展的空间：一是未深入分析抗战背景下救国团体兴起的具体动因、演进过程、变化趋势，进而揭示抗战推动侨团组织转型的内在机制；二是可拓展海外侨团研究的国别覆盖范围。加拿大华侨人数长期位居美洲第二，[5]侨团类型多样，侨社结构复杂，是拓展海外侨团国别研究范围的良好切入点。就加拿大华侨华人史研究而言，学者普遍将抗战时期视为加拿大华侨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初步分析了华侨救国团体的兴起原因、特征和具体活动，[6]但缺乏对全面抗战爆发前加拿大华侨救国团体概况的追溯。近期，潮龙起利用新史料补充了局部抗战时期美洲华侨救国团体发展的史实。[7]这一研究表明，学界愈发关注局部抗战时期海外侨团的动态变化。实际上，1937年七七事变前，加拿大华侨就已经在40余座城镇建立起50多个救国团体，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建立更具广泛性、统领性的华侨救国团体奠定了组织基础，反映出华侨民族国家认同不断强化的历史趋势。

因此，本文以加拿大华侨救国团体为例，基于《大汉公报》和其他一手资料，将救国团体置于华侨地方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变迁的宏观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从宏观历史视角来看，近代华侨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辛亥革命以前，华侨社会以地缘关系为重要纽带，主要表现为对祖籍地的认同。辛亥革命使得华侨民族主义愈发强烈，表现为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认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中日矛盾的激化，华侨民族主义升华为爱国主义，对中国的认同拓展为对民族、国家、政府乃至领袖的认同。其中，华侨为声援祖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济南惨案”而发起的反日运动，是华侨从民族主义升华为爱国主义的标志性事件。[8]基于该视角，本文将具体分析九一八事变后华侨救国团体兴起的动因，系统梳理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加拿大华侨救国团体的演进过程，并探究这一过程对加拿大华侨社团组织转型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深化对抗日战争与海外侨团组织转型之间关系的认识，能够丰富海外侨团变迁史、加拿大华侨史的研究。

一、抗日战争与华侨社团转型的缘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原有侨团在目标定位、组织规模、活动范围和动员能力等方面难以适应抗战需求。在此背景下，组建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新型团体成为加拿大华侨参与民族救亡的重要途径。

（一）日本侵华重塑侨团的共同目标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加拿大侨团主要分为七类，包括同乡会馆、宗亲会、业缘行会、文教团体、堂会、政治团体和教堂会所。[9]一方面，长期以来，侨团主要以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关注范围聚焦本地侨社和侨乡，主要功能在于侨胞互助、侨社自治、利益维护和联系侨乡等；另一方面，早期华侨地方和宗族观念浓厚，华侨社会内部因政治和经济利益冲突而斗争不断。[10]不同侨团较难围绕民族危机等公共议题，自觉形成超越自身利益的共同目标。

1923年，加拿大通过《中国移民法》，全面禁止华侨入境，对加拿大华侨社会产生严重影响，致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使华侨人口减少、唐人街日渐萧条。1929 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与在加日本人商业竞争的加剧，导致以洗衣工、厨工、杂工和木工等职业为生的加拿大华侨失业人口增加，生存处境持续恶化。[11]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华侨关注的主要问题。饱受种族歧视和排华政策压迫的加拿大华侨意识到，自身命运与祖国抗战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只有支持祖国抵御外来侵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才能在侨居地获得生存空间。如温哥华华侨称："保国即是保家，若今见危不救，以致国破家亡，纵拥有万金，身已为人奴隶矣。"[12] 由此，加拿大华侨突破了"有家族观念，无国家观念"[13] 的传统认知局限，逐步实现从地方认同向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转变。

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华侨增强了中华民国国民身份意识，[14] 逐渐形成了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共同目标。如温哥华国民党号召："倭贼入寇我国，强占我东三省，残我同胞无数，我侨岂能袖手旁观，语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等身为国民一份子，既不能执干戈而卫国家，当为声援以寒贼胆。"[15] 维多利亚致公堂、达权社 ① 倡议："与倭贼宣战，复我国土，振我国威，拒日救国。"[16] 蒙特利尔宪政党 ② 也呼吁："愿我侨胞，尽国民之责，御外侮，杀倭奴，争回土地，勿使我神州大陆有患强邻之吞并也。"[17] 可见，高涨的爱国情绪推动加拿大华侨从关注自身利益转向国家命运，将抗日救国视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在这一共同目标下，加拿大各地爱国侨领开始组织侨胞创建救国团体。

（二）救亡运动推动侨团突破组织边界

加拿大既有侨团的成员构成、权力范围和社会资源，受到地缘、血缘、业缘和党派关系限制，大多独立运行、彼此间联系较弱。有些堂会因存在经济利益纠纷，时常发生"堂斗"，严重损害华侨间的团结。[18] 虽然个别侨团在发展过程中吸纳了不同侨团代表加入，并因此拓展了协调侨务、救济侨胞和维护侨社秩序等功能，但其活动范围基本局限于当地，缺乏形成跨地域协作网络的社会条件。如中华会馆虽被誉为"华侨最高级之侨务机关"，[19] 且在九一八事变前已经遍及加拿大几乎所有的华侨社区，但各地中华会馆长期各自为政，并没有实在的统属关系，尚未形成跨地域的联合机制。[20]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引起华侨的强烈不满，马占山、蔡廷锴等爱国将领奋起抵抗以及国内救亡运动的发展，鼓舞了加拿大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热情。然而，随着华侨救亡运动的开展，筹款汇款分散、抵制日货活动规模有限、对外宣传声势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亟须团结不同政治背景、社会阶层、地方和宗族来源的侨胞。这客观上要求原本相互独立甚至存在竞争关系的侨团，围绕共同的救国目标开展深度合作。因此，建立多元侨团联合、跨城镇协作的救国组织成为现实需要。

在这一现实需要推动下，一些侨团开始探索联合救国的组织形式。如曾为竞争关系的多伦多致公堂与宪政党公开宣布合作，以顺应联合救国的潮流："我两党同人等亦属国民份子，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视为义不容辞，爰是不敢躬与菲薄，协同组织此会，以尽国民一份之责也。"[21] 又如，温哥华侨商前往维多利亚，联合当地侨商开展抵制日货运动。[22] 可见，民族救亡运动的发展推动侨团突破原有的血缘、地缘和党派边界，并促使侨团在联合过程中形成新的救国团体。

（三）抗战动员要求侨团提高组织能力

早期同乡会馆等侨团的领导者多以家长式的专制作风行使职权，其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表现出

① 晚清时期，孙中山在革命运动中获得北美洪门人士的支持。中华民国建立后，洪门致公堂与孙中山在组党问题上发生分歧。孙中山想要争取洪门致公堂成员加入中华革命党，洪门人士则认为此举是变相铲除洪门，两者关系破裂。1915 年 11 月 12 日，一批坚决维护洪门信条的中坚分子在维多利亚成立"达权社"，以"达我公权"为宗旨。只有纯粹的洪门会员且已具有数年会员经历才有资格加入达权社。参见［加］黎全恩、丁果、贾葆蘅：《加拿大华侨移民史 1858—2001》社科卷·上，北京：华夏出版社，2022 年，第 184~185 页。

② 中国宪政党由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徐勤、伍宪子和梁朝杰等人创建，源于保皇会，可追溯至强学会，后改名为中国宪政党，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参见《中国宪政党改组宣言》，《大汉公报》1929 年 2 月 8 日。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一定的封建社会特性。[23]在这种组织模式下，侨团内部决策主要依赖少数核心领袖，组织运行较多依靠私人关系，动员范围和跨社团协调能力受到限制，因而难以满足抗战时期大规模社会动员的需要。

九一八事变后，加拿大华侨的救国活动不仅得到南京国民政府驻加领事机构的支持，也受到国内政治力量的动员。国民政府驻温哥华领事周熙岐支持当地华侨创建救国团体，[24]驻渥太华总领事李骏发表捍卫国家主权的演讲，呼吁华侨关注国家危局。[25]国民党海外党务委员会动员华侨在“每地成立抗日救国联合会”。[26]国民政府则致电多伦多救国团体，动员华侨捐款支援祖国抗战。[27]广东地方政权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亦加强了与加拿大华侨的联络，如胡汉民致信温哥华“新国民党”① 党员胡峰卓，要求其昭告国民党驻加支部“于抗日救亡积极为有效之措置”。[28]侨团成为连接祖国动员与华侨抗战的纽带。

动员广大侨胞开展抵制日货、募集捐款和对外宣传等集体行动，有赖于具有较强组织动员能力的救国团体。正如抗日将领方振武访加时的呼吁：“抗日一定要有组织，然后才有力量。”[29]面对大规模抗战动员的需求，华侨社会亟须在既有侨团基础上，建立目标明确、组织稳定、运行规范的新型救国团体，以重新整合分散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并通过完善组织模式、管理制度来提升组织能力，从而实现对广大侨胞的有效动员。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各类侨团基本形成了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一致目标，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侨团面临突破原有组织边界、调整组织模式和提升组织动员能力等现实需要，由此开启了建立新式救国团体的探索。

二、加拿大华侨救国团体的演进过程

民族危机对侨团组织演进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救国团体的广泛兴起。在中日战局的影响下，加拿大华侨救国团体经历了由兴起、扩散、竞合到整合的发展过程，整体上呈现出从分散走向统一的演进趋势。

（一）星火西燃：华侨救国团体的兴起

九一八事变后，加拿大华侨救国团体率先兴起于西海岸的大城市。这并非偶然，而是得益于特殊的地理、人口和历史因素——西海岸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和维多利亚较早建立起华侨救国团体。据加拿大统计局 1931 年人口普查报告，全加共有 46519 位华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华侨人数占 58.3%。该省华侨主要居住在商业繁荣且交通便利的港口城市温哥华和维多利亚。[30]自晚清民初以来，这两座隔海峡相望的城市便是康有为和孙中山等政治人物推动中国改良和革命的重要海外阵地，驻有致公堂、宪政党和国民党等政治团体及各类宗亲侨团、同乡会馆。[31]另外，致公堂《大汉公报》和国民党《新民国报》刊载的新闻，使该地侨胞迅速获悉祖国的抗日形势。以上因素表明，分布密集的华侨人口、深厚的政治运动传统、及时传播的祖国新闻，共同为华侨救国团体的成立创造了条件。其中，温哥华更成为全加拿大最早成立华侨救国团体且数量最多的城市。

加拿大华侨救国团体的兴起呈现出自西海岸向内陆和东部省份推进的趋势。艾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和曼尼托巴省位于加拿大内陆，至 1931 年，三省华侨人数统共仅占全加华侨总量的 19.5%。[32]然而，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艾伯塔省省会埃德蒙顿和商业繁荣的卡尔加里、萨斯喀彻温省省会里贾纳和大城市萨斯卡通均相继组建救国团体。东部的安大略省是加拿大第二大华侨聚居省份，华侨人口达全加华侨总量的 14.9%，仅次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魁北克省的华侨数量相对较

① 在与蒋介石斗争的过程中，胡汉民等人于 1932 年秘密成立“新国民党”，并注重争取华侨力量。温哥华国民党曾石泉、梁缉光和胡峰卓等人接受胡汉民的领导、加入该党，但仍利用原有的国民党部从事活动。参见陈红民：《“新国民党”在海外的活动：1932—1936 年》，《民国档案》2002 年第 1 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少，仅占 5.9%。[33] 由于侨社关系复杂，两省的经济中心多伦多 ① 和蒙特利尔较晚才建立救国团体。

表 1　九一八事变后加拿大华侨救国团体的兴起概况

成立时间	所在省份	所在城市	团体名称	领袖人物	组织规模
1931.09.24	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	温哥华（Vancouver）	华侨拒日救国会	徐如悦	98 人
1931.10.13			全加洪门救国拒日会	刘孔正	45 人
1931.12.01			华侨拒日救国会	黄兰瑞	25 人
1932.01.04			华侨拒日救国协进会	黄灼世	不详
1931.10.04		维多利亚（Victoria）	华侨拒日救国会	钟玉楼	15 位委员
1931.10.25			致公堂达权社拒日后援会 ②	邓云章	22 人
1931.10.18		新威斯敏斯特（New Westminster）	拒日救国会	刘云伯	不详
1931.10.27			洪门拒日会	李来百	22 人
1931.11.11		美里特（Merrit）	救国拒日后援会	蔡益隆	不详
1931.12.10		基落纳（Kelowna）	拒日救国会	黄臻贤	约 12 人
1931.12.14		艾伯尼（Port Alberni）	华侨联合拒日会	关定育	约 13 人
约 1932.01		克兰布鲁克（Cranbrook）	拒日救国会	马撰俊	不详
1931.10.15	艾伯塔（Alberta）	埃德蒙顿（Edmonton）	拒日后援会	黄　式	不详
1931.10.24		莱斯布里奇（Lethbridge）	洪门救国拒日会	温用宽	40 人
约 1931.11			华侨拒日会	黄立晃	不详
约 1931.12		卡尔加里（Calgary）	华侨拒日后援会	雷家驿	约 12 人
1931.10.18	萨斯喀彻温（Saskatchewan）	萨斯卡通（Saskatoon）	华侨拒日救国后援会	朱伯宽	不详
1931.10.18		里贾纳（Regina）	拒日救国会	曾　郁	不详
1931.11.01	安大略（Ontario）	多伦多（Toronto）	致公堂宪政党拒日救国会	黄寿如	约 37 人
1931.11.22		加林巴（英文地名不详）	救国后援会	余赞赓	不详
1931.11.08	魁北克（Quebec）	蒙特利尔（Montreal）	致公堂宪政党拒日救国会	李文瑞	不详

资料来源：《大汉公报》1931 年 9 月 25 日，10 月 6 日、7 日、13 日、16 日、20 日、24 日、27 日、30 日、31 日，11 月 4 日、13 日、17 日、30 日，12 月 16 日、17 日，1932 年 1 月 5 日、14 日，2 月 4 日，3 月 2 日；《申报》1931 年 12 月 27 日；《海外党务指导通讯（第七期）（1940 年 9 月—10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一一（2）/3487。

总之，九一八事变激发了加拿大华侨对祖国命运的关注，饱受种族歧视和排华政策压迫的加拿大华侨迅速建立救国团体。因受人口、地理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华侨救国团体率先从西海岸的大城市兴起，并逐渐向内陆和东部省份扩散。

① 据温莎市英文报纸报道，在加东致公堂和宪政党联合成立救国团体前，多伦多 23 个侨团已成立了一个中国爱国联盟，并准备开展筹款活动，但缺乏其他史料相互佐证。参见“Push Boycott of Jap Goods”，*The Border Cities' Star*，October 19，1931.

② 该会成立后不久便改名为华侨拒日洪门协进会，仍由邓云章担任会长。参见《华侨拒日洪门协进会职员表》，《大汉公报》1932 年 2 月 13 日。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二）燎原之势：华侨救国团体的地缘扩散

目前学界较为重视大城市华侨救国团体的成立与发展，缺乏对中小城镇的关注，以致难以形成对华侨救国团体发展规律的整体性认识。实际上，1932 年一・二八事变后，加拿大爱国华侨的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高涨，中心城市的华侨救国团体发挥了更广泛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了周边中小城镇救国团体的建立。

与维多利亚同处温哥华岛的中小城镇纳奈莫、坎伯兰、邓肯和彻梅纳斯，相继成立以中华会馆或致公堂为依托的救国团体。在温哥华华侨的影响下，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内陆中小城镇的救国团体也迅速扩散，如淘金热矿区弗雷泽河沿岸的利卢埃克、奇利瓦克，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中南部的普林斯顿、弗农和基落纳，靠近落基山脉的纳尔逊、罗斯兰、特雷尔和雷夫尔斯托克等。可见，加拿大华侨救国团体在一・二八事变后极大地突破了中心城市的地域范围，在中小城镇迅速扩散。

由于加拿大内陆和东部省份的华侨数量相对较少，其救国团体仍主要集中于省会或其他商业中心城市，如安大略省的渥太华和温莎、曼尼托巴省的温尼伯、新不伦瑞克省的圣约翰和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这类区域的救国团体，在数量和扩散速度方面，远不及西海岸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表 2　一・二八事变后加拿大华侨救国团体的扩大概况

成立时间	所在省份	所在城市	团体名称	领袖人物	组织规模
1932.02.03	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	普林斯顿（Princeton）	华侨拒日救国后援会	黄述传	约 19 人
1932.02.04		鲁珀特王子港（Prince Rupert）	救国后援会	梁葆常	11 人
1932.02.07		纳奈莫（Nanaimo）	华侨拒日救国会	不　详	不详
1932.02.14			洪门拒日救国会	郑忠鎏	19 人
1932.02.07		邓肯（Duncan）	拒日会	不　详	不详
1932.02.07		利卢埃克（Lillooet）	拒日会	马炯刚	不详
1932.02.07		彻梅纳斯（Chemainus）	华侨拒日救国会	郑厚相	25 人
1932.02.09		坎伯兰（Cumberland）	华侨洪门拒日会	马心直	19 人
1932.03.02			拒日救国会	马基辅	37 人
1932.02.10		纳尔逊（Nelson）	华侨拒日后援会	黄崇弼	不详
1932.03.08			华侨拒日洪门协进会	胡忠遵	约 7 人
1932.02.11		基洛纳（Kelowna）	洪门拒日救国协进会	吴德淑	20 人
1932.02.13		罗斯兰、特雷尔（Rossland、Trail）	救国拒日会	马超彝	22 人
1932.02.21		乔治王子城（Prince George）	拒日会	不　详	不详
约 1932.02		弗农（Vernon）	拒日会	罗俊焯	不详
1932.02.23		雷夫尔斯托克（Revelstoke）	拒日救国会	不　详	不详
1932.02.25		奇利瓦克（Chilliwack）	华侨洪门拒日救国会	陈良晃	42 人
1932.02.18	艾伯塔（Alberta）	梅迪辛哈特（Medicine Hat）	洪门华侨拒日会	关煜勋	不详
1932.02.11	萨斯喀彻温（Saskatchewan）	山地允（英文地名不详）	救国拒日后援会	黄宗权	不详
约 1932.04		穆斯乔（Moose Jaw）	拒日救国会	不　详	不详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续表

成立时间	所在省份	所在城市	团体名称	领袖人物	组织规模
1932.03.21	曼尼托巴（Manitoba）	温尼伯（Winnipeg）	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	邓鸿发	不详
1932.02.10	安大略（Ontario）	温莎（Windsor）	华侨拒日会	不　详	不详
1932.02.19		威廉堡（Fort William）	华侨救国会	不　详	不详
1932.03.07		渥太华（Ottawa）	致公堂宪政党拒日会	不　详	不详
1932.03.16			华侨拒日救国会	不　详	不详
约 1932.04		签文（英文地名不详）	拒日会	不　详	不详
1932.02.24	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	圣约翰（Saint John）	华侨拒日救国会	谭声礼	不详
1932.03.01	新斯科舍（Nova Scotia）	哈利法克斯（Halifax）	洪门拒日救国会	谭畅贤	不详
1932.02.04	不详	打市巧妇（英文地名不详）	华侨拒日会	蔡　壮	不详
1932.03.26	不详	劣孔列姐（英文地名不详）	华侨拒日救国会	麦乾初	不详

资料来源：《大汉公报》1932 年 2 月 5 日、9 日、11 日、12 日、15 日、17 日、18 日、20 日、22 日、23 日、25 日，3 月 1 日、2 日、4 日、8 日、16 日、26 日；《华北日报》1932 年 3 月 16 日；《民国日报》山东版 1932 年 4 月 17 日；《加拿大华侨捐款（一）》（1932 年 2 月 20 日—6 月 3 日），台北“国史馆”藏，001-067140-00020。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的奋起抵抗，鼓舞了加拿大华侨支持祖国抗战的信心，推动各地华侨掀起新的救国团体创建热潮。从总体上看，温哥华和维多利亚的华侨救国团体对周边中小城镇发挥了更显著的辐射带动作用，内陆和东部省份的救国团体也有所增加，但仍主要分布在大城市。

（三）内部分野：华侨救国团体的党派竞合

1932 年 3 月，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植成立“伪满洲国”，刺激并强化了华侨的爱国主义情绪，且对华侨救国团体的动员范围与组织整合能力提出新要求。这些救国团体既承担支援抗战的救亡功能，也成为不同政治力量扩大政治影响、争取侨社话语权和领导权的载体，由此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局面。

九一八事变后建立的温哥华华侨拒日救国会虽被国民党把控，但致公堂成员也在其中担任一定要职，如温哥华致公堂正议长、全加洪门救国拒日会会长刘孔正兼任该会执行委员。[34] 随着该会组织规模的扩大，更多的国民党人加入其中并担任要职，致公堂成员却被排斥于重要职位之外。1932 年 9 月，温哥华华侨拒日救国会第二届职员换届选举中，刘孔正离任，全加致公堂总办事处总理梁焕南、副总理张椿杰、总务科长林翰元、候补参事陈廷光、正理财陈宜显和副理财郑振秀等洪门人士仅保留普通科员身份。[35] 换言之，致公堂在温哥华华侨拒日救国会中愈发失去话语权和领导权。与此同时，由于不满国民党一党专政、对日妥协和私吞华侨捐款的行为，① 致公堂提出了独立行动的救国方案，如林翰元提出：“洪人自后须要万倍秘密，切实进行，歼杀国贼，抵御倭奴，救国救民。”[36] 在温哥华华侨拒日救国会组织内部，温哥华致公堂与国民党围绕领导权的竞争愈发激烈。

面对日本侵略势力在东北的持续扩张，建立一个值得侨胞信任、制度完善且组织周密的救国团体成为华侨社会迫在眉睫的难题。1932 年 11 月 15 日，为动员侨胞捐款，温哥华华侨拒日救国会邀

①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国民政府财政部筹赈会和各社团纷纷致电海外侨胞，呼吁捐款救国。然而，诸多捐款并未被转交给前线的十九路军，反而被私吞。这一消息被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刊登，随后被《大汉公报》转载，引起华侨愤慨。参见梦蝶：《国民党政府吞骗华侨捐款与陷害十九路军之铁证》，《大汉公报》1932 年 4 月 21 日。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集各侨团代表商议组织大规模劝捐队。[37] 27 日，以温哥华国民党特别党部为首的 20 多位侨团代表在中华会馆召开会议，经过反复协商，最终决定成立温哥华华侨援助东北义勇军筹捐处（以下简称筹捐处）。[38] 筹捐处依托更广泛侨团的支持，为开展筹捐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瓦解前，筹捐处是华北事变前加拿大组织规模最庞大、制度建设较完善、救国行动最活跃的华侨救国团体，承担了加拿大西海岸华侨社会相当一部分筹款和汇款重任。

筹捐处核心领导层基本由温哥华华侨拒日救国会领袖兼任，两团体在人事方面具有密切关联，如温哥华华侨拒日救国会首届监察委员、第二届执行委员胡峰卓成为筹捐处领导人，执行委员关耀南、关崇颖、朱广炜、李日如、叶求茂兼任筹捐处执行委员。[39] 这些具有国民党身份的富裕侨商在会务决策中仍占据了筹捐处的多数席位，这不仅取决于他们在侨团中的经济实力和声望地位，还跟其与祖国的密切联络及广泛的社会政治网络相关。例如，国民党驻加拿大总支部执行委员胡峰卓，不仅是沙堆侨安总会的领袖，还被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聘为顾问，[40] 多重身份有助于他在筹捐处职员选举中赢得多数选票。然而，致公堂中仅有郑振秀作为劝捐员加入筹捐处。[41] 可见，社会政治资源丰富的国民党侨商掌握了筹捐处的主导权。

致公堂与国民党部的侨商在救国立场上既具有合作空间，又存在话语权和领导权的较量。尽管新建立的筹捐处未能促成国民党与致公堂的进一步合作，但仍在资源整合方面付出一定努力，从而推动了华侨救国团体的阶段性进步。由此，加拿大华侨救国团体通过筹捐活动既支持了祖国抗战，又增进了与祖国的联系。

（四）趋向统一：华侨救国团体的组织整合

1935 年日本侵略军蚕食华北，蒋介石却继续采取对日妥协政策，祖国政局变动引发太平洋彼岸华侨社会的连锁反应，建立统一且强大的救国团体成为加拿大华侨的紧迫任务。在抗日将领方振武的推动下，温哥华各类侨团合作发起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抗日救国会），推动加拿大西海岸华侨救国团体出现统一趋势。

面对华北危机，1935 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呼吁海内外同胞团结抗日。曾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抵御日本侵略的将领方振武，受中国共产党及其《八一宣言》的影响，前往北美宣传不分党派、联合抗日的政治主张，[42] 并于 1936 年 4 月，在美国旧金山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总会。[43] 1936 年 5 月 4 日，该救国总会致电温哥华中华会馆，称方振武将前往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与侨胞“交换抗日救国意见”。[44] 31 日，方振武途经维多利亚，乘船抵达温哥华。[45]

方振武抵达温哥华后，积极推动不同侨团摒弃隔阂，缓和侨社内部矛盾，促进抗日救亡力量的整合。31 日当晚，方振武首先拜访致公堂，称赞洪门人士支持孙中山“共行革命，功业实不可泯”，表达“深望贵堂昆仲与侨界及全国民众联合，不分党系，在同一战线上，以抗暴日，而拯危亡”的期盼。[46] 在严峻的抗日形势下，致公堂愿意放下成见，赞同方振武联合抗日的政治主张，为之后与国民党部合作发起救国团体奠定了思想基础。由雷、方和邝姓侨胞建立的温哥华溯源总堂尤其重视方振武的到来。6 月 2 日晚，溯源总堂为方振武举办欢迎会。方振武引经据典，称赞雷、方、邝姓氏族历代祖宗均为忠烈之辈，呼吁溯源总堂侨胞“本祖宗之精神，来抗倭救国”。[47] 在华北危机持续加深之际，爱国华侨的宗族观念逐渐升华为国家认同。溯源总堂侨胞救亡图存的情感诉求得到方振武的积极回应，成为支持方振武在温哥华建立救国团体的重要力量。

在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下，方振武与侨领在温哥华合作发起救国团体。1936 年 6 月 3 日，方振武在华人戏院慷慨激昂地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回忆自身保卫济南和华北的斗争，严厉谴责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政策。在场听众“咬牙切齿，大呼打倒汉奸”。致公堂会长郑振秀顺势邀请方振武指导侨胞创立抗日救国会。方振武提议建立一个“毫无政治意味，与各种爱国团体亦不互相抵触”的救国团体，倡导“不愿为亡国奴，不分党派，均可以国民一份子资格参加”。“迎方会”随即派职员向在场侨胞分发纸条，凡是赞成组织抗日救国会者即可签名加入。[48] 方振武加西之行取得的最大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成果便是与华侨领袖联合发起抗日救国会。

国民党、致公堂、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等政治团体和各类宗亲会、同乡会馆、职业团体及广大侨胞在抗日救国会这一平台上实现合作。[49] 6月5日晚，温哥华华侨在中华会馆召开预备会议，当场推选曾云峰为临时主席，聘请方振武为名誉会长。[50] 6月7日，该会全体职员在中华会馆举行宣誓就职礼，方振武到场监誓并致训词，鼓励全体职员投身抗日救国工作。[51] 两广事变爆发后，方振武返回旧金山指导会务，[52] 曾云峰继续积极领导救国会的组织工作。1936年6月10日，该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53] 随后便发布《温哥华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会成立宣言》，[54] 向海内外同胞表明抵御日本侵略的决心。在七七事变前，抗日救国会是加拿大西海岸乃至全加首个具有统领地位的华侨救国团体。

总之，在抗日将领方振武的推动下，广大侨胞站在救国立场上联合创建抗日救国会，并将其发展为具有统领意义的华侨救国团体。该会促进了加拿大局部区域华侨救国团体的统一，顺应了海内外同胞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潮流。

三、救国团体发展与侨团组织变革

救国团体的发展改变了加拿大传统侨团的组织运行逻辑，促使侨团在社会功能、互动关系、组织网络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发生变革，折射出抗战时期侨团组织演进的新趋势。

（一）侨团功能公共化：从侨社事务到民族救亡

随着救国团体的发展，加拿大侨团功能逐渐从维护华侨合法权益、协调侨社内部关系、沟通华侨与侨乡等内部事务，转向捍卫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公共责任。

其一，救国团体推动侨团突破以内部事务为中心的活动范围，参与到具有社会动员性质的公共救国活动中。在救国团体的号召下，温哥华黄云山总公所等宗亲会加入抵制日货运动，规定成员不得私自与日商交易，违者予以惩处，[55] 迫使当地日本人鱼店、剪发所、洗衣房和旅馆停业。[56] 其二，救国团体促使侨团成为连接侨胞与祖国抗战力量的公共桥梁。通过筹款活动，救国团体保持侨团与马占山、蔡廷锴等抗日将领的书信往来，[57] 同时尝试与上海抗日救国总机关联络，誓为祖国后盾。[58] 其三，救国团体促使侨团转变为面向国际社会的重要公共平台。温哥华救国团体曾致电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日本侵华行为。[59] 该会领袖徐如悦还多次前往温哥华西人浸信会、西人青年联会，向当地白人群体揭露日本侵华罪行。[60] 相较于此前华侨因语言隔阂、种族歧视与主流社会割裂联系的状态，救国团体通过反侵略宣传，扩大了与白人社区的交流，进一步拓展了侨团的公共影响力。

救国团体通过开展规模化的抵制日货、筹款和国际宣传活动，推动传统侨团突破以侨社内部事务为中心的功能范围，使其拓展了动员广大侨胞救国、联结祖国抗战力量和开展国民外交等公共功能。

（二）侨团关系密切化：由分立竞争走向团结合作

救国团体的发展，也促使侨团逐渐打破血缘、地缘、业缘和党派关系界限，在共同的救国目标下形成了更为密切的协作关系。

受原有侨团组织基础、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差异的影响，起初各类救国团体仍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分立格局。以中华会馆为依托的华侨救国团体通常被国民党掌控，典型代表如国民党徐如悦领导的温哥华华侨拒日救国会；[61] 致公堂因与国民党政见不同，往往另组洪门救国团体，如致公堂董事邓云章与副政治科长林天如领导成立的维多利亚致公堂达权社拒日后援会；[62] 宪政党因与致公堂具有抗日反蒋的一致目标而相互合作，如加东致公堂领袖、《洪钟报》总理黄寿如领导建立的多伦多华侨拒日救国会。[63] 不同政治团体均试图借助救国团体来扩大自身影响力、争取话语权和领导权，因此，许多城市出现两个甚至更多救国团体并存的局面，尚未形成统一的领导机构。可见，缓和政治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团体之间的矛盾，是实现侨团广泛联合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尽管致公堂与国民党之间的政治分歧制约了双方合作，但其他侨团的联合仍在推进。中小城镇华侨数量较少、筹款数额低，加之经济危机期间跨国汇款成本较高，捐款难以顺利汇给祖国。筹捐处的成立，改变了此前不同侨团各自开展筹捐活动的状态，其组织基础包括温哥华国民党特别党部、中华会馆、拒日会、台山宁阳会馆、开平会馆总所、香山福善堂、番禺昌后堂、粤秀书社、华侨农业总会、卖菜侨生会、沙堆侨安总会、龙冈公所、至德堂、林西河堂、九牧公所、爱莲公所、李氏总公所、中华基督教会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64]筹捐处成立后，侨团合作募捐范围不断扩大，最远延伸至萨斯喀彻温省卡维埠的侨团。[65]可见，在筹款支援祖国的共同目标下，侨团之间加强了跨组织协作。

在方振武与侨领合作发起抗日救国会后，加拿大西海岸侨团初步实现了超越党派政见、宗族观念和地缘关系的广泛联合。该会提出“在不分党派之下，号召侨胞，联合一致，共同抗日”，[66]为国民党、致公堂和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等侨团的合作搭建了平台，从职员的政治身份来看，虽然该会领导层仍以国民党为主，但致公堂亦重获重要席位。郑振秀上升为具有一定话语权的领导者，与颇具资历的国民党党员曾云峰、黄寄生一同担任常务委员。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干部代表梁任农也加入该会，但仅担任总务科员。[67]此外，该会还获得其他不同类型侨团的支持，如以李氏公所为首的宗亲会、以台山宁阳会馆为首的同乡公所、以广智学校为首的侨校、以中华农产商会为首的行业团体、以醒侨剧社为首的文化团体和中华基督教会的支持。[68]抗日救国会推动原本存在竞争与分歧的侨团实现联合，促使侨团关系由相对松散走向更加紧密。七七事变前，抗日救国会成为加拿大西海岸乃至全加具有统领地位的华侨救国团体。

（三）侨团网络组织化：从分散布局走向跨域联结

九一八事变后，华侨救国团体的发展推动各地侨团突破以地方为中心的分散布局，逐步建立跨城镇的组织网络，并进一步延伸至跨国关系网络。

起初，加拿大各地救国团体虽迅速兴起，但缺乏总的领导机构和稳定的联络机制。例如，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加拿大已经建立起 57 个不受血缘和地域限制的致公堂。[69]九一八事变后，凡建有致公堂的华侨社区大多成立了洪门救国团体。正如潮龙起所言：“洪门及其领袖在推动美洲华侨抗日救国团体的创建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70]然而，洪门组织网络并未自然转化为救国团体间的统一行动机制。维多利亚致公堂为温哥华岛区域总堂，下辖纳奈莫和坎伯兰等 5 个分堂。[71]但现有史料尚无法证明纳奈莫和坎伯兰的洪门救国团体统属于维多利亚洪门救国团体。

一·二八事变后，温哥华和维多利亚的华侨救国团体，在动员周边城镇侨胞方面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一些人数稀少、地理位置偏僻的华侨社区也相继建立起救国团体。而且这些救国团体还呈现出跨城镇的组织特征，或由几个中小城镇联合建立救国团体，或由大城市的华侨救国团体在周边中小城镇设立劝捐站。普林斯顿华侨在当地建立拒日救国后援会后，又联合附近河谷村落基里米奥斯（Keremeos）的华侨，以扩大组织规模。[72]坎伯兰华侨拒日救国会则在附近的联合矿场（Union Mine）和泱汝设立了 4 位常驻劝捐员。[73]卡尔加里华侨拒日后援会在附近 40 个小镇设置邻埠特委专员。[74]这种跨城镇的组织形式，强化了中心与边缘城镇华侨之间的联系，推动分散于各地的救国团体逐步建立跨地域的组织网络。

随着华北局势日益紧张，救国团体网络组织化趋势进一步显现。1935 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美国华盛顿、纽约等地侨团，趁方振武赴北美动员华侨抗战之契机，提出全美洲华侨联合抗日救国计划，并请其指导成立全美洲反日大联盟。[75]这一倡议，反映出侨界对建立跨地域救国团体的探索。随后，方振武与旧金山华侨合作建立抗日救国总会，并赴温哥华、维多利亚建立分会，[76]将加拿大华侨救国团体纳入全美洲华侨联合抗日救国运动之中，拓展了救国团体的跨国组织网络。

有学者已经注意到早期加拿大华侨救国团体互不统属、各行其是的缺陷，认为救国团体在七七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事变后才逐渐统一起来。[77]但从前文可知，早在1936年方振武策动30余座城市的华侨成立抗日救国会后，[78]北美华侨救国团体网络已经呈现组织化发展趋势。这些救国团体依托总会—分会模式，初步形成跨地域甚至跨国的联系。虽然此时北美华侨救国团体尚未完全改变互不统属、各自为政的状态，但在外力刺激和内部驱动下，逐渐显露出统一趋势，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四）侨团运行制度化：由传统惯习到现代制度

救国团体通过选举、任期、财务管理等制度，推动加拿大侨团突破以侨领权威和传统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家长式组织，逐渐向职权分明、集体决策和规范运行的委员制组织转变。

相较于早期成立的救国团体，筹捐处改进了组织架构和管理制度。筹捐处下设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和文书、会计、宣传、庶务、交际部，[79]共69位职员，拥有15个劝捐队，共有105位劝捐员。[80]筹捐处不仅对各科职员的职权作出明确规定，而且制定了较为合理的筹款和汇款制度：无论捐款多少，均一律登报表扬，所有捐款，当即交会计主任保存，第二日立即存入银行；凡是提支款项，超过10元者须经执委会同意才能提支，超出50元者要经职员会议通过才能提支；筹捐处提支券要有执行常委、监委常委、文书主任和会计主任4方签名才能生效；除经费开支外，捐款全部汇给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职员任期为12个月，唯独会计主任不得连任。[81]这种透明登记、多重监督和严格审批的管理制度，不仅有助于确保捐款和汇款安全、提高工作效率，也增强了侨胞对救国团体的信任。

方振武领导成立的抗日救国会进一步完善了制度建设。该会设23位执行委员和9名候补执行委员，[82]下设总务、财政、调查、组织、交际、庶务、宣传、妇女和青年9个部门。[83]1936年6月13日，该会公布《加拿大温哥华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会章程》，对会务开展、职权分工、财务管理和任期均作出具体规定。该会每年召开一次会员大会，每月召开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必要时或在十名以上会员的要求下召开临时会议。这种制度建设，将侨团领袖聚集到同一组织中，使原本的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制度化。同时，为防止私人关系、权力过度集中，该会还设计了严格的任期和财务制度。职员任期为一年，财政部部长不得连任，以减少职员间形成过密私交或利益勾连的可能性。所有收入存入银行，提款时须经总务部部长、财务部部长和常务委员共同签字，才能生效。上述制度限制了权力的私人化，保障了组织运作的规范性，有利于维持不同侨团之间的长久合作。[84]

加拿大华侨救国团体的制度建设，并非简单增加组织章程和管理规则，而是在传统侨团组织关系的基础上，调整运行机制。通过明确组织层级、规范职权分工和完善财务监督制度，救国团体改变了以往侨团对个人威望、私人关系和传统惯习的依赖，使不同类型的侨团在统一的制度规范下开展合作。救国团体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探索，也为其他侨团完善组织架构和规章制度提供了借鉴。

四、结语

华侨与抗日战争的历史，是一部当地华侨社会的成长和演变史。[85]抗日战争对海外华侨社团的组织演进有着多方面的影响，既刺激了华侨救国团体的兴起与发展，又推动传统侨团逐渐向现代组织转型。以加拿大为例，在民族危机加剧、华侨国家认同强化以及抗战动员需求扩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各地华侨救国团体相继成立，并经历了从兴起、扩散、竞合到趋向统一的演进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加拿大侨团的功能由侨社互助转向民族救亡，组织关系由分立竞争转向密切合作，社团网络由地方分散转向跨域联结，运行机制由传统惯习转向现代制度。这些影响并非局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短期刺激，而是具有促使传统侨团转向现代组织形态的长久作用。与此同时，完成转型的海外侨团进一步提升了动员、组织和协调能力，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深入开展，为祖国抗战提供了重要支持。因此，抗日战争与海外侨团组织变革之间是双向互动、彼此促进的关系。

从宏观视角纵观海外侨团组织演进历程，救国团体是近代华侨社会地方主义淡化、民族主义高涨、爱国主义发展的重要体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激发了加拿大华侨的救亡意识，在高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下，侨团原有的地方主义逐渐淡化。围绕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一致目标，加拿大侨团开始超越地方、宗族、党派和行业界限，初步实现联合，为海内外同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爱国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这既受中日战争局势、国内政治力量及救国组织抗战动员的影响，也得益于加拿大爱国侨领和广大侨胞的共同努力，同时与抗日将领海外宣传及全球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互动密切相关。

总之，加拿大华侨救国团体的组织演进，既是抗日战争推动海外侨团整合与功能转型的缩影，也折射出海外华侨从地方认同、民族认同迈向国家认同的历史趋势。

［注释］

［1］张秀明：《海外华侨与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若干问题再思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5年第3期。

［2］程希：《抗日战争对海外华侨的影响》，《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曾瑞炎：《华侨与抗日战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9页；黄小坚、赵红英、丛月芬：《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北京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陶季邑：《抗日战争对海外华侨的影响》，《贵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任贵祥：《华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北京：团结出版社，2024年，第215页。

［4］李明欢：《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6~66页；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人社团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英］班国瑞、邓丽兰：《英国华侨社团的历史演变与当代华人社会的转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美］麦礼谦：《略谈美国华侨、华人的一些社团》，广东华侨历史学会编：《广东侨史论丛》第三辑，香港荣誉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157~173页；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161页；赵红英、宁一：《五缘性华侨华人社团研究》，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58页。

［5］《海外各地华侨人数比较表》，《侨务月报》1935年第2卷第5期。

［6］［加］魏安国、詹森等著，许步曾译：《从中国到加拿大》，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89~302页；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年，第419~421页；黄昆章、吴金平：《加拿大华侨华人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18~224页；［加］黎全恩、丁果、贾葆蘅：《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16~417页。

［7］潮龙起：《美洲华侨与抗日战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8~147、158页。

［8］庄国土：《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1911—1941年南洋华侨对中国认同的变化》，《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9］潮龙起：《美洲华侨与抗日战争》，第49~66页。

［10］［加］黎全恩、丁果、贾葆蘅：《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2001》社科卷·上，北京：中国华夏出版社，2022年，第275~281页。

［11］潮龙起：《美洲华侨与抗日战争》，第28~29、39页。

［12］《加拿大云高华华侨援助东北义勇军筹捐处成立宣言》，《大汉公报》1932年12月16日。

［13］斯福：《中国人民须速奋起》，《大汉公报》1931年9月28日。

［14］潮龙起、吴俊青：《社会动员视域下的民族主义话语与抗战时期华侨祖国认同的构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

［15］《侨胞组立拒日后援会》，《大汉公报》1931年9月24日。

［16］《维城致公总堂达权总社拒日救国后援会宣言》，《大汉公报》1931年11月3日。

［17］《满城致公堂宪政党组织拒日救国会》，《大汉公报》1931年11月17日。

［18］潮龙起：《近代美国侨社控制体系的构建及演变——以堂会为考察中心（1882—1931）》，《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19］《敬告云埠侨胞书》，《大汉公报》1933年12月15日。

［20］［加］黎全恩、丁果、贾葆蘅：《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2001》社科卷·上，第257页。

［21］《加东致公堂宪政党拒日救国宣言》，《大汉公报》1931年11月14日。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22]《中华商会集议拒日种种》,《大汉公报》1931年9月28日。
[23]潮龙起:《美洲华侨与抗日战争》,第56页。
[24]《中华会馆抗日大会情形》,《大汉公报》1931年9月28日。
[25]《总领事对中日战争事宣言》,《大汉公报》1931年11月14日。
[26]邓雪峰:《华侨抗日救国的策略》,《中央导报》1931年第18期。
[27]《都城邦人捐大款帮助杀贼》,《大汉公报》1932年2月1日。
[28]《胡汉民覆胡峰卓胡英三函稿》,陈红民缉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3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53页。
[29]李廷光记:《方将军在云埠侨民大会演讲词(七)》,《大汉公报》1936年7月9日。
[30][加]黎全恩、丁果、贾葆蘅:《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第365、367页。
[31][加]陈忠平:《维多利亚、温哥华与海内外华人的改良和革命(1899—1911)》,《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1期。
[32][加]黎全恩、丁果、贾葆蘅:《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第367页。
[33][加]黎全恩、丁果、贾葆蘅:《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第367页。
[34]《加拿大云高华华侨拒日救国会职员名表》,《大汉公报》1931年10月7日。
[35]《职员表:加拿大云高华华侨拒日救国会第二届职员表》,《拒日特刊》1933年第2期。
[36]《洪门大会之盛况》,《大汉公报》1932年12月28日。
[37]《拒日会集议记》,《大汉公报》1932年11月16日。
[38]《拒日会集议及组织筹饷局纪略》,《大汉公报》1932年11月28日。
[39]《援助东北义军筹捐处职员选定》,《大汉公报》1932年12月5日。
[40]《侨委会第五次常会》,《民国日报》广州版1931年8月21日。
[41]《坎拿大云高华华侨援助东北义勇军筹捐处职员表》,《大汉公报》1932年12月10日。
[42]《吴玉章自传》,《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43]《美国三藩市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会总章(缘起)》,《救国时报》1936年5月30日。
[44]《迎方会职员昨日就职》,《大汉公报》1936年5月18日。
[45]《欢迎方将军之热闹》,《大汉公报》1936年6月1日。
[46]《方将军到公堂演说》,《大汉公报》1936年6月1日。
[47]《溯源总堂迎方之盛况》,《大汉公报》1936年6月3日。
[48]《欢迎方将军大会》,《大汉公报》1936年6月4日。
[49]《抗日会职员选定就职》,《大汉公报》1936年6月8日。
[50]《加拿大云高华中华国民抗日救国会定七日下午二时成立》,《大汉公报》1936年6月6日。
[51]《抗日会职员选定就职》,《大汉公报》1936年6月8日。
[52]《檀山来电欢迎方将军》,《大汉公报》1936年6月8日。
[53]《抗日会开第一次会议》,《大汉公报》1936年6月11日。
[54]《云高华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会成立宣言》,《大汉公报》1936年6月17日。
[55]《黄云山总公所拒日长红照录》,《大汉公报》1931年10月15日。
[56]《邦人抵制贼货之效力》,《大汉公报》1931年11月20日。
[57]《马占山来函谢收犒款》,《大汉公报》1932年3月23日。
[58]《拒日会日昨集议纪略》,《大汉公报》1933年2月9日。
[59]《拒日后援会昨日之去电》,《大汉公报》1931年9月29日。
[60]《徐如悦积极向外宣传》,《大汉公报》1931年11月7日。
[61]《拒日后援会昨日演讲情形》,《大汉公报》1931年9月25日。
[62]《域埠洪人组织拒日会》,《大汉公报》1931年10月30日。
[63]《加东致公堂宪政党共同拒日救国》,《大汉公报》1931年11月4日。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64]《拒日会集议及组织筹饷局纪略》,《大汉公报》1932年11月28日。
[65]《义军筹捐处募捐消息》,《大汉公报》1933年3月10日。
[66]《抗日救国会通告照录》,《大汉公报》1936年11月25日。
[67]《抗日会职员选定就职》,《大汉公报》1936年6月8日。
[68]《迎方车辆与代表数量》,《大汉公报》1936年6月3日。
[69][加]黎全恩:《洪门及加拿大洪门史论》,香港: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53~154页。
[70]潮龙起:《美洲华侨与抗日战争》,第389页。
[71][加]黎全恩:《洪门及加拿大洪门史论》,第156页。
[72]《片辰埠加罅猫拒日后援会汇款犒师》,《大汉公报》1932年2月26日。
[73]《冚巴仑埠华侨拒日救国会职员表》,《大汉公报》1932年3月2日。
[74]《卡城华侨拒日后援会民国廿二年职员一览表》,《大汉公报》1933年2月23日。
[75]《侨胞请方将军发起组织全美洲反日大同盟》,《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1936年3月28日。
[76]筱唐氏:《为域埠中华民国国民拒日救国会成立宣言》,《大汉公报》1936年6月29日。
[77]李盈慧:《跨越边界:华侨在中国抗战、太平洋战争中的行动和意义》,《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3期。
[78]Roman Lapica,"Chinese Warlord Asks Unity in Fighting Imperial Japan",Middlesboro Daily News,July 3,1936.
[79]《援助东北义军筹捐处职员选定》,《大汉公报》1932年12月5日。
[80]《坎拿大云高华华侨援助东北义勇军筹捐处职员表》,《大汉公报》1932年12月10日。
[81]《义军筹捐处章程决定》,《大汉公报》1932年12月23~24日。
[82]《中华国民抗日救国会定七日下午二时成立》,《大汉公报》1936年6月6日。
[83]《抗日会职员选定就职》,《大汉公报》1936年6月8日。
[84]《加拿大云哥华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会章程》,《大汉公报》1936年6月13、15~16日。
[85]吴敏超:《从临时难民到落地生根:二战前后的新西兰华侨女性》,《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6期。

[责任编辑:乔印伟]

·书讯·

《赴金山:19世纪淘金热中的华人移民与全球政治》出版

美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亚裔美国人研究专家艾明如(Mae Ngai)所著的《赴金山:19世纪淘金热中的华人移民与全球政治》一书于2026年8月由岳麓书社出版。1848–1899年,人类从地下开采出的黄金总量超过此前三千年的总和,为无数个人与国家带来难以估量的财富。然而,在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与南非的淘金场,华人与白人定居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催生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华人问题"之争:美国与大英帝国会否立法禁止华人移民?作者耗费十余年、跨越五大洲,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实证研究,彻底打破了长期流传的"华人苦力"刻板叙事。全书以19世纪中叶全球黄金开采狂潮为线索,记述了超30万华人自愿离开故土,奔赴"金山"淘金,以及他们如何建立社群与组织,在危机四伏的陌生环境中艰难求生的历程,完整还原了华人移民在早期全球化浪潮中的真实处境与历史角色,深刻揭示了"华人问题"的起源、演变与当代影响。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